



印度對華戰爭

(澳大利亞)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著

香港南粵出版社

印度對華戰爭

澳大利亞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著

香港南粵出版社

印度對華戰爭

(澳大利亞)內維爾·馬克斯韋爾著

出版：南 粵 出 版 社

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六號二樓

印刷：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一九七六年二月初版 每冊港幣十四元

譯者的話

本書作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是澳大利亞人，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倫敦。曾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讀書。一九五五年進入《泰晤士報》當外交記者，後派往該報華盛頓辦事處工作。一九五九年後，他任該報駐南亞記者，常駐新德里。當時正值中印邊界爭端日益激化和印度對華戰爭爆發的前後，在此期間，他同印度軍政官員接觸甚廣，對當時印度形勢的發展和中印邊界爭端有過不少報道。一九六七年他回到倫敦，進入東方和非洲學院，研究有關中印邊界歷史和中印邊境衝突等問題，並着手寫作本書。

作者在書中回顧了中印邊界爭端的歷史演變和印度邊境政策的形成過程；着重敘述了印度方面如何一步步走上同中國對撞的道路，觸發了邊境戰爭，以及印軍失敗的全部過程和停火後印度局勢的變化。作者引用了若干未經印度官方發表過的資料，並對有關問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由於作者從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出發，在敘述和論斷中有不少謬誤和不符合事實之處。希望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注意加以分析。此外，在引用中國的資料時也有若干差錯。對後者，在能夠查到原文的情況下，我們已作了必要的校正或註釋。

5/11/6/2/00

目 錄

序	一
歷史引言 帝國的界限	一一
一、西段	一三
二、麥克馬洪綫	三九
第一章 對撞的方針	七一
一、方針已定	七三
二、躲躲閃閃	一五二
第二章 前進政策	一九三
第三章 北京的觀點	二九五
第四章 邊境戰爭	三三三
一、山脊和河流	三三五
二、兩個山口之間	四二三

第五章	停火以後	四七九
註解	五二四
參考書目	五六二
附：人名中英文對照表	五六八
地名中英文對照表	五七五

地圖目錄

中印邊界的西段和中段簡圖	七—八
中印邊界的東段簡圖	九—一〇
西段邊界的歷史發展	三七—三八
東段邊界的歷史發展	六九—七〇
西段的互相衝突的主張	一九五—一九六
在西段的前進政策	二九七—二九八
塔格拉山脊的戰鬥	四一四—四一五
東北邊境特區的戰鬥	四八一—四八二

序

中印邊界爭端是二十世紀中葉國際關係史上富於戲劇性的一段。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亞洲的兩個偉大的新共和國，儘管政治性質不同，似乎已經走上和睦合作的道路，但後來却爲了幾塊荒涼的、艱險的、沒有什麼價值的土地爭吵起來，還打了一場短促而劇烈的邊境戰爭。印度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由此一落千丈。同中國友好曾經是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制定的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印度奉行不結盟政策，當世界各國是如此清楚地劃分成兩個集團的時候，印度拒絕把它的命運同任何一個集團——共產黨的或反共產黨的——聯繫在一起；在國防上依靠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獨立自主；冒着武裝部隊受到削弱的風險，集中力量發展經濟——這一切都取決於同中國的友好和有一條和平的北部邊界。同中國發生衝突，北部邊界上形勢緊張，就需要支出巨額軍費，這樣就會使支撐尼赫魯的各項政策的拱門整個垮下來。尼赫魯的統治地位也會隨之告終。

這一爭端以及作爲它的高潮的邊境戰爭，加強了一般認爲中國是一個好戰的、沙文主義的、擴張主義的國家的那種看法。六十年代末，當中蘇邊界爭端日益尖銳化、中蘇這兩個巨人劍拔弩張的時候，人們不免回想起中國同印度的爭吵，這就使世界輿論容易接受俄國對中俄爭端的說

法，甚至助長這樣一種想法：中國由於在邊界問題上總是抱毫不妥協的態度，現在可能要得到應有的報應了。近年來，國與國之間的所有爭吵，都沒有像中印爭吵那樣具有充分的文獻：雙方都長篇大論地、反覆地向對方以及向任何願意聽的人，解釋自己的立場。然而，這一爭端背後的事實真相似乎又是那樣的模糊，而且很少有人願意客觀地加以探討，所以任何現代的國際事件，從來沒有像這一樁那樣廣泛地全然被人誤解。

我對這個题目的興趣是從一九五九年八月底到達新德里擔任《泰晤士報》(The Times)記者時開始的。那時，我立即投入本書所敘述的事件的報道工作。在我到達前幾天，發生了中印邊境上的第一次武裝衝突，即朗久(Langju)事件。在隨後的三年裏，一直到邊界戰爭的高潮過去之後，印度同中國的爭端以及它所派生的各種問題，是我的工作的一項主要課題。

我曾經計劃圍繞一九六四年尼赫魯的去世，寫一本關於六十年代的印度的書。我開始重寫中印爭端的始末，就是想把它作為那本書的一個章節。當初，我把這項工作看成是對我過去隨着這一爭端的發展而寫的成萬字報道進行重新編排和加工的問題。可是，當我再次翻閱盈篇累牘的印度白皮書（其中記載着有關兩國政府在外交辯論中所提出的論證），我認識到需要對問題作出更為全面、更為基本、更為深入的估價。這本書就是我後來進行重新估價的產物。不過，我之所以寫這本書，仍然是因為我對新德里當時如何處理和看待這一爭端，有些親身的了解。各種人物都登台表演，而且互相影響，他們的態度，以至他們的情緒，在這一爭端中以及有關的印度政治演變中起着重要作用。也許就是在這種地方，目睹事態經過的記者比事後進行探索的學者在條件上更為有利些。事情過後，只有寫在紙上的證據，至於那些露出微笑或皺着眉頭的表情，不快的或

傲慢的語調，未入記載的獨白等等，却都已遺忘掉了。

我在一九六七年年中離開印度前，多次訪問了過去負責處理這一爭端的印度的政界人士和官員們以及曾試圖在軍事上貫徹政府的政策的軍人們，並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以便再次探究中印爭端真相。當我在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作研究員以完成這項研究並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試圖首先從歷史發展上來看中印邊界爭端，不僅把它看作是二十世紀中葉亞洲兩個最大國家之間的衝突，而且看作是一百五十年來在喜馬拉雅山的兩邊及其周圍在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勾心鬥角的繼續。關於喜馬拉雅地區的歷史和這一地區內的各條邊界的歷史，歷史學家以及其他學者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已經作過許多闡述。我在寫本書開頭一部份時，曾借助於他們的著作。本書的這一部份追溯了有爭議的邊界的歷史。我想，這對理解後來發生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

本書的佈局大致上是按時間順序的，不過在各章節之間也經常交叉。某一事件，在某一章節裏已經提到，也許在另一章節裏又作詳細介紹。或者是某一件事在某一章節裏從一個角度寫了，也許在下一章節裏又從另一個角度來寫。《北京的觀點》這一章是試圖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這一爭端，重新提到了許多在前兩章已經描述過的事情。我認為這個嘗試是需要的，因為人們一直是從印度的觀點來觀察整個爭端的。而且，正如一位英國人在本世紀初評論另一位英國人時說的：「要使從印度來的人相信中國的觀點也值得考慮，那無疑是困難的。」*

• 見第五五頁註。

只要有可能，我對所引用的聲明、講話之類都註明了出處。但是可以看到：在關於邊境戰爭及其醞釀階段的章節裏，這種註解大大減少了。在這幾章裏（以及在本書的其他一些地方），我引用了印度政府和印度軍隊的未經公佈的檔案和報告中的材料。有些官員和軍官讓我使用了這些材料，他們認為，現在該是整理出一部對事情原委的全面敘述的時候了。而他們相信我是能夠把它寫得公正的。當然，我不能寫出他們的姓名，也不能註明我引用材料的文件或檔案的出處。我只能感謝他們，並且希望他們不至於失望。

曼克卡爾（D. R. Manekar）在研究獨立後的印度軍隊的歷史時，也同樣被允許查閱未經公佈的檔案，他讓我從他的原稿中引用一份關鍵性的備忘錄的內容，我向他表示感謝。

我試圖理解雙方在這一爭端中是受什麼因素支配的。可以看出，有時候一方對另一方所持立場的誤解，在加劇新德里和北京之間的分歧上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在這一點上，我是比較清楚了。我的意圖只是敘述和澄清一樁歷史事件，我認為這個事件是廣泛地被誤解了，而且當它發生的時候，我自己對之也有誤解。我無意於指責任何一方，而且確信，雙方往往是認為自己的正直精神受到了傷害而採取行動。這是看得出來的，當然這樣做只能使衝突加劇。

本書中出現一種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狀態。這是由於我獲悉邊界爭端的情況，在一方比在另一方方便得多。印度就其政治上的工作程序而言，一定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公開的社會之一，而我爲了寫這本書進行研究時，這個好處使我得益非淺。不過，在中印爭端問題上，印度政府也許由於它的公開性已經吃了些虧，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如果一個人仔細研究一個政府的公開言論和私下的（實際上是秘密的）態度之間的差別，那就不免使人們對它產生惡感。尼赫魯的對外公開的講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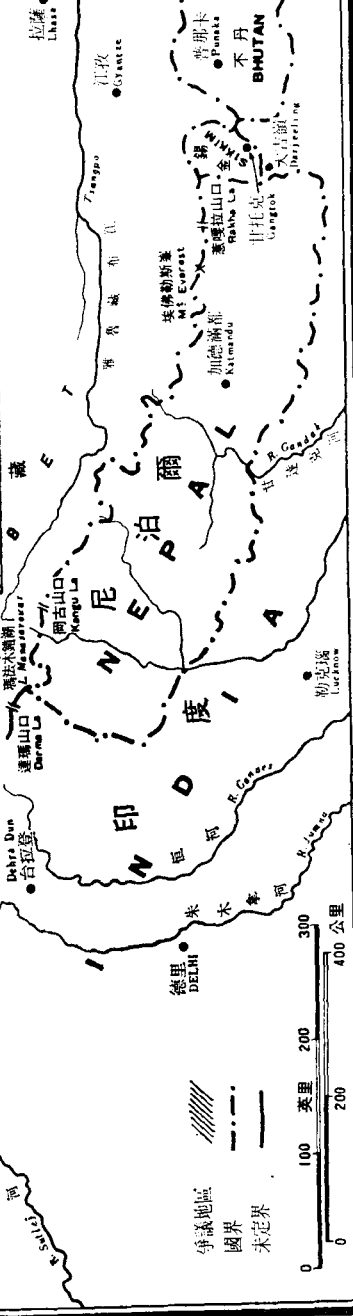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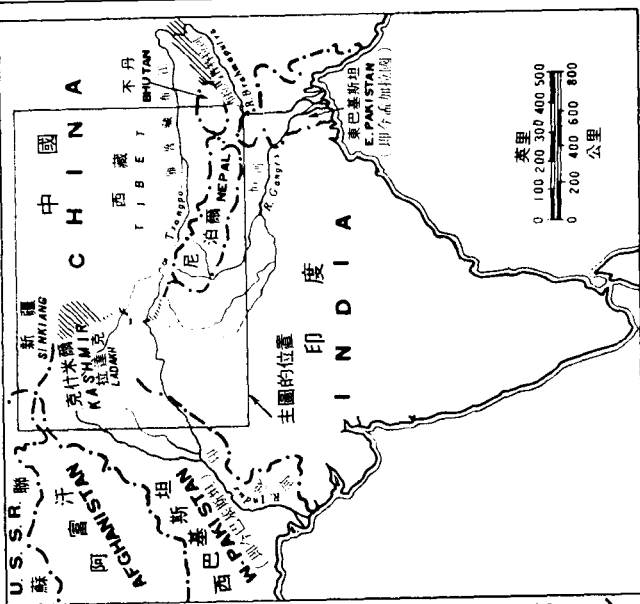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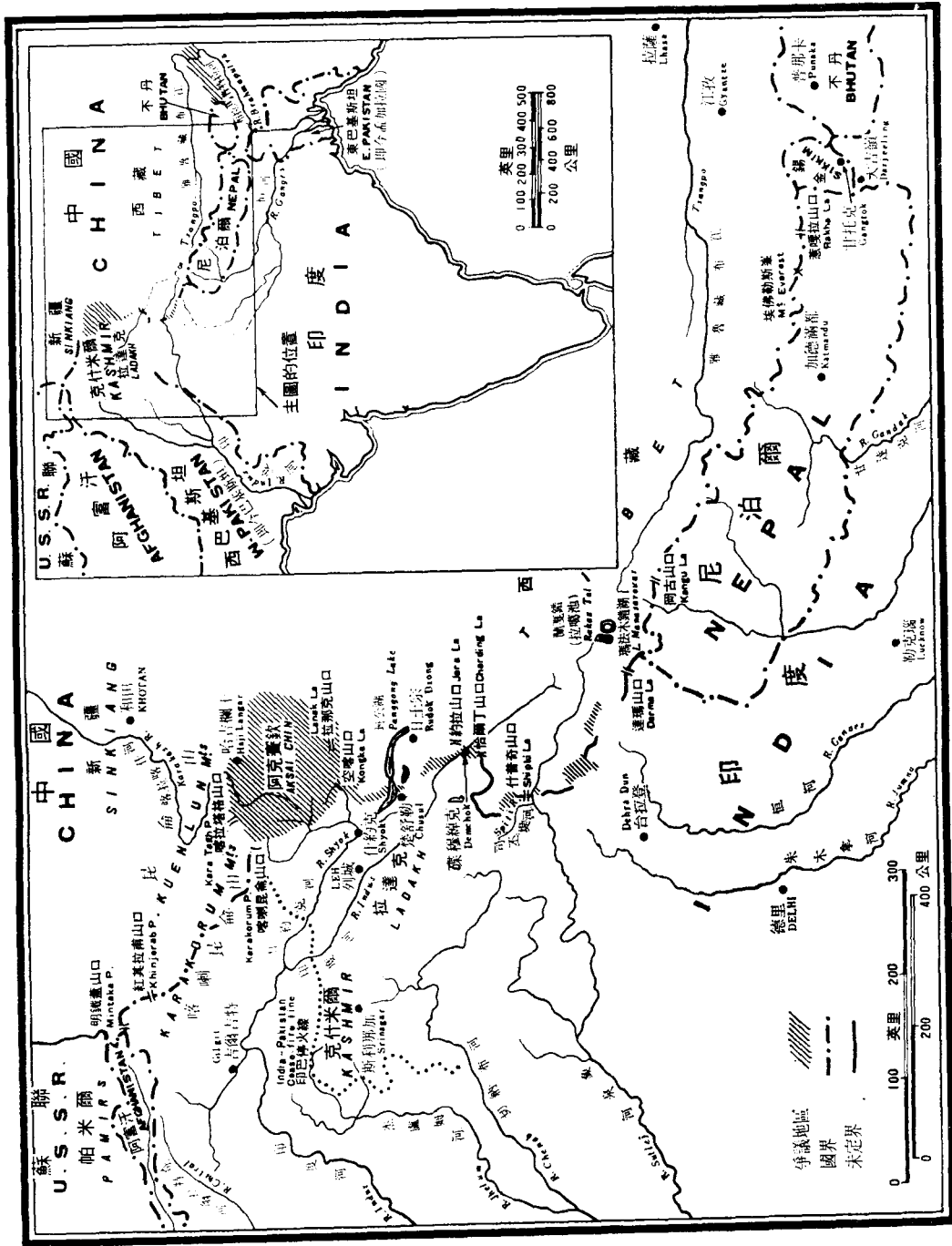
數量是如此之多，因此他就特別容易被人加以前後矛盾的罪名，而他故意含糊其詞的地方，也是一下就被人看穿的。相形之下，就內部工作程序而言，沒有哪一個政府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不公開。在追溯中國的政策形成過程時，我除了公開發表的材料以外，沒有別的可供查考。公開的材料倒是非常豐富，不過，反映猶豫、前後矛盾、分歧以至表裏不一的證據自然是完全找不到了，而在印度的政府和軍方內部磋商的記錄中這種證據有時是顯露出來的。因此，誰在北京有像我接觸印度的記錄那種條件，那麼中國的政策大概看起來不會這樣前後一致，也恐怕不會這樣講究實效。也許將來研究這些事件的人們能夠糾正本書中的不平衡狀態，他們手頭有了更充分的文件材料，將會發現我的敘述上的不足之處和解釋上的差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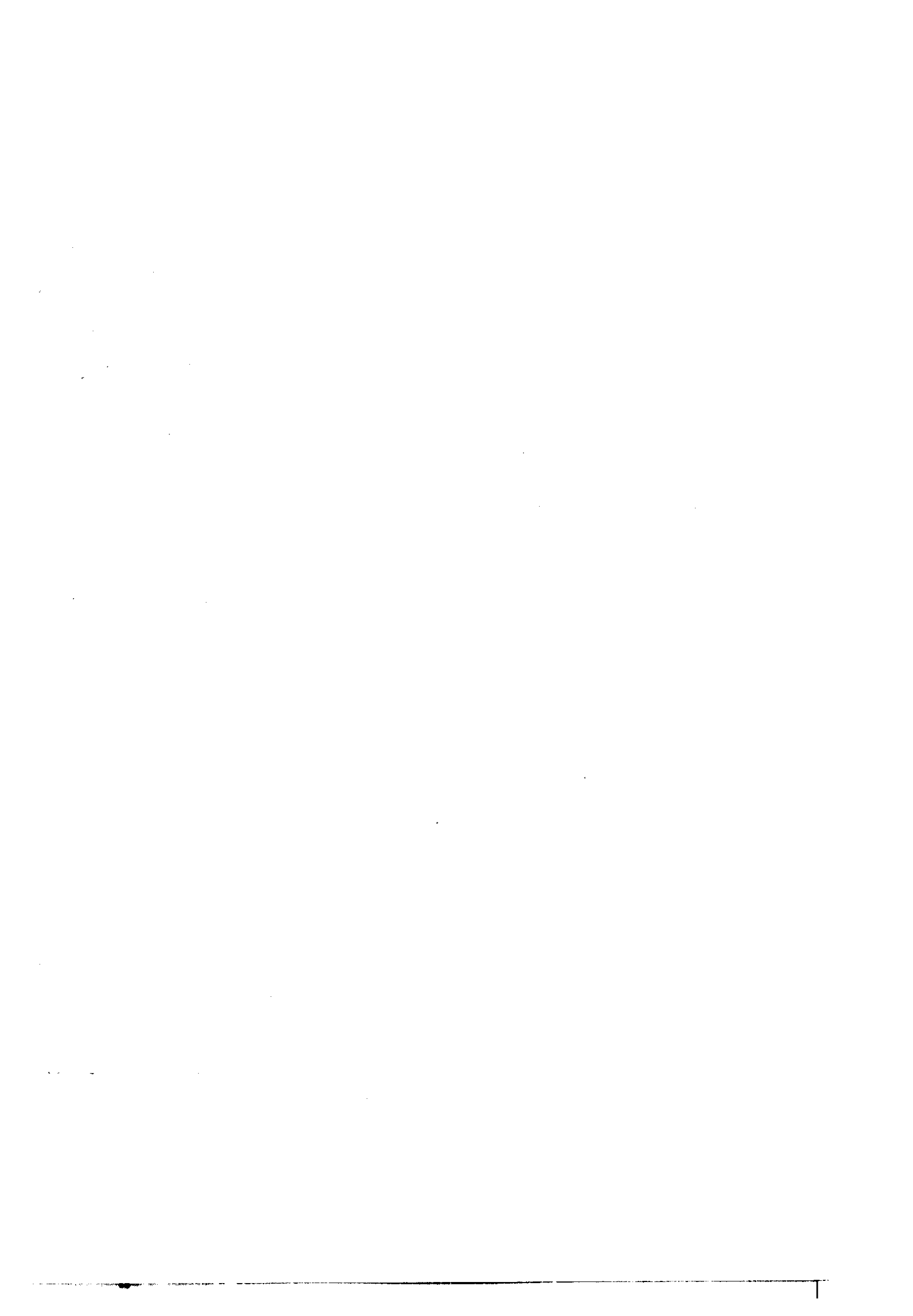
我能夠有機會用將近兩年的時間來寫這本書，要感謝倫敦大學的東方和非洲學院，特別是它的主任菲利普斯（C. H. Phillips）教授，他的關心、鼓勵和建議對我是極其可貴的。

我要特別感謝的其他人士有：羅納德·西格爾（Ronald Segal），在有關本書的許多事情上給我鼓勵，向我提出意見；斯·戈帕爾（S. Gopal）博士雖然他肯定將完全不同意這本書的見解，但是鼓勵我寫這本書的熱情從未因之而減弱；邁克爾·布里徹（Michael Brecher）教授嚴肅認真地讀了原稿；阿爾斯太爾·藍姆（Alastair Lamb）教授也讀了原稿，對我很有幫助，並讓我引用了他沒有發表的一篇關於阿克賽欽的論文；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教授根據他本人對這些事件的直接了解，指出了一些細節和着重點上的毛病；多蘿西·伍德曼（Dorothy Woodman）女士允許我引用她寫的《喜馬拉雅邊疆》（Himalayan Frontiers）中的一些新材料；庫爾迪普·內雅（Kuldip Nayar）讓我預先讀了他寫的《兩綫之

間》(Between the Lines)；羅伯特·哈登巴克(Robert Huttenback)教授閱讀和評論了我寫的歷史引言部份；《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編輯戴維·威爾遜(David Wilson)和《泰晤士報》遠東問題專家胡理士(Richard Harris)閱讀和評論了我寫的中國對這一爭端的觀點的部份；約翰·艾迪斯(John Addis)允許我引用了他為哈佛大學寫的關於中印爭端的沒有發表的論文。本書的地圖是貝克(D. R. Baker)繪製的。格雷姆·格林(Graham C. Greene)始終如一地關心我的寫作，對我是一種有力的支持。魯賓(A. P. Rubin)博士讀了我最後的草稿，對我很有幫助。對以上所有的人，我都表示感謝。

書中如有差錯和判斷不當之處，當然由我自己負責。





中國 TIBET

